

# 乡镇工业发展中的人情与利益关系互嵌及其效应

## ——基于环保视角和浙江G镇照明产业的案例分析

蒋培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人情与利益关系互嵌所形成的信任合作机制能帮助小城镇企业减少各类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支持,为当地企业与民众之间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提供保障,促进企业在初期发展中的快速成长。同时,人情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互嵌的不断强化,逐渐形成一个稳固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企业经营者等地方精英利用这种人情和利益“互嵌”的关系模式,消解了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能,遏制了居民的环境抗争意识与举动,最终导致乡镇工业陷入“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的怪圈。

**关键词:**乡镇工业;环境污染;人情关系;利益关系;互嵌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5)05-0040-06

### **Embedment of human relations and intere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and its effect: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and the case of G Town in Zhejiang lighting industry**

JIANG P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med by the embedment of human relations and interests will help small towns businesses reduce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promote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and establish a stabl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and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rapid growth in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interest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mutual inlay, and gradually form a solid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unity, which can be used by the business owners and other local elites to clear up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function and restrain the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struggle agains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ventually, it will lead the industry to form a vicious circle of "the more economy develops the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ed".

**Keywords:** rura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uman relations; interests; embedment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乡镇与村庄都形成了“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作出了贡献,但各类环境问题逐渐显露,

成为制约当地持续发展的主要阻碍。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案例来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及场景下出台的应对机制各不相同。有的传统村落依然会利用传统规范来限制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如陈阿江提及的村落规范对环境污染的控制作用<sup>[1]</sup>。有的村庄则通过各种环境抗争行为来抵制环境污染,如景军笔下的大川村个案<sup>[2]</sup>。有的村庄在环境污染过程中不仅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手段与应对措施,反而呈现出一种工业经济发展越快与环境问题越严重的并存局面,且当地大部分居民对环境污染的产生都有着直

收稿日期:2015-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SH021);国家留学基金委基金公派出国项目(201406710015);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学子项目(13ZHFD05);江苏省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ZZ13\_0231)

作者简介:蒋培(1987—),男,浙江余杭人,博士研究生,美国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环境管理。

接或间接的“贡献”。不少居民参与了环境污染的过程，大部分居民对周边环境污染持放任的态度，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和行动。在这些地区，环境污染似乎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当地居民也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环境危害的耐受力。

为此，笔者拟从人情与利益的视角，分析人情关系与经济利益在乡镇工业发展中的效应，以及二者如何影响当地政府和居民对工业污染的看法和行为。

### 一、人情与利益互嵌关系的形成

“人情”在我国是一个很早就出现的概念，《礼记》就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孔子还说：“人情者，圣人之田也。”<sup>[3]</sup>人情关系是乡土社会中能够保持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由人情关系的长期存在而产生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和规则，人们能够依靠人情来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或获取更多的其他利益和价值。按照金耀基的定义，人情可以分为三类：人之常情；在人际交往中表达感情时，所互相交换的资源；人们相处或交往的法则<sup>[4]</sup>。阎云翔认为人情是一种基于常识的伦理体系，具体包括三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人情的变化和伸缩就是由于这三个维度不断变化的组合<sup>[5]</sup>。翟学伟把人情定义为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它是中国人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sup>[6]</sup>。笔者认为，人情可以被界定为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联系起来的一种交换性资源，表现为日常人际交往的纽带和方式。人情关系是熟人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脱离了人情关系，一个人就难以在熟人社会中正常地生活，会被排除在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熟人社会中因为存在人情关系而与现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怕口说无凭，要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因为这是规矩。”<sup>[7]</sup>按照韦伯的视点，现代社会是依赖于一套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这套制度

强调法律的普遍性，排除个案的特殊性对规则适用的影响<sup>[8]</sup>，可以被称之为契约社会。而中国社会关系的建构是从家庭关系拓展开来的，“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sup>[9]</sup>在中国社会中，正是基于这种人情关系，才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建立起来了与“己”相关的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式<sup>[10]</sup>的亲疏关系，而在西方社会中却难以找到此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子。

在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资源交换的方式在不断地进行再生产过程，以实现自己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在现代工业经济制度下，人情关系对工业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人情交换过程和经济交换过程相互融合，紧密地“互嵌”为一体，难以准确地分清人情关系与利益关系各自所存在的领域和范围，利益关系借助人情而不断地进行增值和扩充，而人情关系也在利益关系的影响下进行再生产。正是两者的“互嵌”和融合，在实现个体最终目标尤其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具有一致性时，人们的行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整体的合作性和团结性，能克服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阻碍。格兰诺维特曾指出，经济行为镶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受到各种关系的影响<sup>[11]</sup>。但格兰诺维特所言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侧重于比较正式的组织关系或制度结构，而从人情关系角度来看，更多的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且结构体系比较复杂。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资本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人情交往关系，其交往半径小、相对封闭，人际交往遵从“人情法则”，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忽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建立，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sup>[12]</sup>准确地说，在中国社会中，大量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仍然“嵌入”在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络之中<sup>[13]</sup>。正是这种人情和利益关系的“互嵌”，庇护了大量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使得各种法律制度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出现。

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此种“互嵌”关系模式影响而形成的乡镇工业发展模式,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水平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具体而言,由于人情关系的合理引导和疏通,乡镇工业在发展初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升级,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却因为人情关系影响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企业生产无序、政府监管不力、民众熟视无睹,造成大量的工业污水直排到当地的水系中,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累积。总之,由于当地人情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不断强化,各种环境问题都被屏蔽在当地的社會关系中,相应的行政监管和法律制裁都无计可施,被排除在社会结构之外,当地企业的生产行为和民众“默认”的态度导致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 二、人情与利益关系互嵌的正面效应

G镇位于浙江省西北部,是一个典型的从农业型村庄发展成为工业型强镇的小城镇案例,由于工业经济总量在全市占据很重要的比重,在当地具有很高的经济社会地位。G镇总面积113.3平方公里,下辖9个行政村,2013年全镇总人口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4315人,外来人口2.5余万人。G镇主要是以照明产业为主导产业,是国内照明产业重要的生产产业基地之一。1995年照明企业数量达100余家,顶峰时期达200~300家。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1995至2007,G镇照明产业企业的总产值由78915万元增长到277722万元。

在G镇工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人情关系对工业经济发展作出的极为重要的贡献。归纳起来看,人情关系主要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发挥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减少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促进企业在初期发展中的快速成长,为工业型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形成的信任合作机制帮助企业减少各类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从G镇照明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照明产业是地方精英引进技术并利用当地的人情关系逐步发展壮大与形成产业集群的。在此过程中,人情关系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形成了资金链。由

于兴办企业需要一定量的资金投入与资金保障,人情关系有助于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兴办企业或解决暂时性的困难;二是形成了技术链。产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技术的传播,而人情关系则为技术的有效传播提供了一个通畅的平台,有助于技术的不断提升与改进;三是形成了产业链。照明产业因其生产特点,随着产品加工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工艺的提 升,逐步形成产业的分工与生产工艺的分化。整个生产流程可以简单分为前、中、后道工序,在产业工序的衔接上,人情关系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前后道工序形成较为持久的合作关系与维持低成本运作,能够充分保障产业链条流动的顺畅与稳定。正如乔治·霍曼斯所言,“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至少在两人之间发生的、或多或少要获得报酬或付出成本的、有形或无形的交换活动。”<sup>[14]</sup>人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成企业自身的一种经济资本,节约企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成本。与此同时,大量的私营企业聚集在同一个区域内,保证了企业之间各类产品信息和市场信息快速、充分地传递和流动,在同一个地域范围内形成信息交流和传递的公共平台,可以有效地减少企业为了寻求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信息所花费的各类成本。

### 2. 推动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支持

人情关系具有一种非公共性,其突出表现是将社会公共生活私人化,即把公共生活分为有“人情”的联系和无“人情”的联系两部分。在有“人情”联系的公共生活中,把公共生活交往关系视同私人关系,首要考虑人情关系的亲疏,因而属于公共生活的一切事务可因人情而通融或变更,公共生活的规则在这里失去效用<sup>[15]</sup>。私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保障,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考核的需要也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人情关系则为两者架起了彼此沟通的桥梁。由于G镇照明企业发展初期资金投入比较紧张,很多企业都是以“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起步,前面是家,后面是厂,所以,在土地、安全、环保等问题上都难以达到相应法律法规的标准,但是利用了当地复杂的人情关系,都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当地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张强有力的保护网,减少了上级政府部门与外来各种负面因

素的干扰,为当地的私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创造了一个极为稳定的发展空间。此外,由于大部分的企业经营者自身同时在政府部门或当地村两委兼任职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政府部门的个体官员更是能与当地的企业经营者形成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合作平台。政府与企业之间由于各自利益和人情关系的作用,形成了一张较为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抵挡住了各种制约当地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进入。

### 3. 为当地企业与民众之间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提供保障

由于当地的企业经营者主要是本地人,与当地社会有着极为紧密的人情关系。企业在兴起之初,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通过人情关系能够在短时间为企业找到充足的劳动力且大大减少了各种信息沟通上的成本。与此同时,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当地人的就业模式比较稳定,不会因为企业之间工资待遇的细微差别而出现频繁跳槽的现象,能够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保障一支极为稳定的工作队伍。此外,正是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所存在着的人情关系,建立起了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强有力的信任机制,在企业出现经济困难或者意外状况时,通过短期内的延时发工资或者停发工资等形式来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期和危险期,为企业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笔者对工人ST的访谈略知一二。“我们本地的工人不会像外地人那样经常因为工厂之间一二百块的差别就跳来跳去(跳槽),老板叫你去干活那都是因为都是邻里乡亲的,大家之间都是有面子的,你今天这里不干跳到别人的工厂里,那时会被大家所看不起的。外地人那是不讲究的,只要是工资高就会换工厂,所以,外地人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有时候老板钱没有要回来,工资发不出,只要是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本地人)都会理解的,也知道老板的确有周转上的困难。等到老板有钱了,也就会把工资发给我们,我们都是很熟的,这点信任还是会有。一般情况下,发不出工资也不会太久,也就二、三个月,到了年底都是会结清的,老板也清楚,这些都是辛苦钱,有钱了的话,一定会及时发给我们的。”

## 三、人情与利益关系互嵌的负面效应

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G镇及周边地区的环境

状况却出现了急剧恶化,不仅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甚至危害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其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这三方面。第一,大气污染。G镇的大气污染主要是汞蒸气的污染。作为节能灯导电材料的重要原料之一,汞是不可缺少的灯具核心组成部分。但由于液态的汞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容易形成汞蒸气散发到空气中。加之各类私营企业除污设备的缺乏,难以及时吸附各类汞废气,汞污染问题就更容易发生。赵海侠于2010年在G镇所做的大气汞污染检测的结论说明,相关污染指数已超标,对当地的大气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sup>[16]</sup>。第二,水污染。在工业水污染方面,由于生产工艺简陋与出于成本的考量,当地企业都利用腐蚀性极强的氢氟酸<sup>①</sup>来对在节能灯生产中的明管<sup>②</sup>(玻璃管)进行洗刷,而产生的工业废水则直接排放到周边的溪河中造成水体污染。同时,在废旧灯管回收利用时,由于回收处理工艺的简陋,很大一部分汞剂、荧光粉外泄入水环境中,对水环境造成了直接的影响。第三,噪音污染。由于G镇的私营企业建设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规划审批,很多工厂与当地居民的住宅混杂在一起。同时,由于生产设备的落后和厂房隔音效果的不佳,很多居民都抱怨噪音污染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很大,而且有些工厂都是二十四小时制全天候生产方式,噪音影响难以消除,很多居民对此苦不堪言。

大量的环境问题暴露出来,当地的基层政府却并没有采取有效的环境管制措施来防止环境污染的蔓延,且当地民众也没有因为如此严重的环境危害而采取比较激烈的环保对抗和环保运动,而是在私底下默默地忍受着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危害。究其原因,是人情和利益“互嵌”关系模式的影响,成功地绑架了地方政府和拉拢地方民众,形成了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来维持当地私营企业长期发展与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把环境问题作为一种外部性问题抛掷在脑后,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公共性问题。

### 1. 消解政府环境行政监管职能

正是由于人情关系的持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正如张玉林所言,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地方官员们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政经一体化体

制”<sup>[17]</sup>。正是这种利益的一致性,使得人情关系成为中国市场化转轨过程中连接地方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纽带,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庇护主义”。<sup>[18]</sup>在经济利益的驱使和人情关系的消解下,G镇政府的环境行政监管职能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为企业的环境污染作掩护、找借口,如通过各种虚假的环境报表和环境监测数据来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甚至在有的时候,政企之间相互“共谋”来应付上级部门的监管,如通过事前向相关企业私下传达上级检查的具体信息,利用企业的停产关门、运转环保设施、替换原材料等方法来应对有关部门的环境检查。通过对当地居民W的访谈,可以获知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失职的情况。

“镇政府和市政府是管不好这些污染问题的,它们和企业是有关系的,企业每年都是要上缴税的……上级部门如果有人来查了,镇政府马上打电话给各个老板,叫他们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他们都是串通在一起的,除非你半夜过来查,也不要通知镇政府。反正市级以下政府基本管理不好,还是要上面的政府多加强管理,或者隔壁县市政府通过反映环境污染情况来投诉了,可能会有点效果。”(2013年12月W访谈录)

## 2. 遏制居民对环境恶化的不满

包括企业的经营者和基层政府官员的各类地方精英会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来努力实现产业的快步发展与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而把环境问题淡化。通过这种强化的经济关系与人情关系的相互作用,经济利益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难以摆脱这张社会关系网络,就像被各种枷锁牢牢地锁住,丝毫没有冲破这张网络束缚的可能性。正如霍曼斯在其遵从定律中指出,一个人为了获得其他成员赞许这样的报酬就会对群体规范发生遵从<sup>[19]</sup>。因此,当地居民的各种对环境问题的不满和抱怨也随着人情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疏通与影响而被遏制住,本应采取的各类对抗性的社会行动也始终没有形成,正如笔者在实地访谈中了解的情况。

“毒肯定是会有点毒的,但你想这这也是很正常的,你想发展工业怎么可能会污染减少,除非是从事一种种植绿色蔬菜或水稻的,可能不会有污染。只要由企业的地方,污染肯定会多起来,人也会多起来,垃圾也会多起来,钱也会多起来,这就

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污染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一个是我们这里就靠节能灯赚钱的,大部分老百姓都在厂里上班,还有就是大家都是隔壁邻居,都是要面子的,你今天去投诉了,那以后就难做人了,比如说隔壁工厂里噪音这么大,你就去跟厂里的老板说一下,加强一下隔音,自己慢慢习惯了也就好了,要做到一点声音没有那是不可能的……”(2013年12月17日CAY访谈录)

## 3. 导致企业陷入低水平生产、高污染的怪圈

盖奥尔格·西美尔认为,货币的产生集中体现了文化的客观性特征,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社会关系也变成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合约关系。此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质上成为物与物的交往。货币的地位一旦确立,它的无处不在的力量就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交往的形式<sup>[20]</sup>。在G镇照明企业发展之初,政企之间的人情关系帮助企业降低了准入行业的门槛,也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在日常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各种环境成本和人力成本等。随着企业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生产规模和生产操作规范化、程序化之后,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也在发生改变,需要引入现代企业生产制度来提高生产效率,但各种政企之间的人情关系反而会制约企业在日常生产中的运行效率和发展规模。当地企业主一方面需要忙于日常的企业生产和管理活动,另一方面还要疲于应付各种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人情关系,有关的企业生产、建设审批项目、检查事宜等,都得通过托关系、走后门、送人情等方式来予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企业经营者把足够精力投入到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未来发展的目标上去,使得企业发展迟迟跟不上同行业竞争者前进的步伐。

与此同时,虽然企业的环境成本在短期发展过程中得以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私营企业由于疲于应付各种人情关系,缺乏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减少污染的动机。以G镇为例,全镇照明产业中超过50%的产品生产仍以手工制作作为主要生产方式,产品生产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生产水平,缺乏技术改进的积极性,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此外,由于受到政企之间的人情社会网络关系的庇护,大量的企业都没有配备合格的工业污染处理设施,而往往是利用各种人情关系来规避法律的制裁。长此以外,企业会形成一种人情

依赖的方式来绑架地方政府和个体官员,导致企业自身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综上所述,G镇个案所表现的区域内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相矛盾的现象,是在人情与利益“互嵌”关系模式的影响下,为了保持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或者说是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形成的大规模环境污染的后果。虽然通过人情关系实现了政企之间的“共谋”关系和民众与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城镇工业经济发展初期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反过来看,正是这种严重的“市场庇护主义”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甚至使当地的民众失去了维护自身生活环境安全的最低底线。

总之,人情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在城镇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出了极大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导致了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正如有人所说,“人情关系的形成既离不开社会现实条件也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一方面人情关系的产生离不开传统的以农为主的生活方式,人们一辈子粘附在土地之上,以血缘亲情为纽带,长期聚族而居,就导致了中国人重视稳定、持久的人情维持。另一方面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施行,以儒家道德哲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开始主宰人们的社会交往。”<sup>[21]</sup>正是由于人情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根深蒂固传统文化和行为模式,所以,要在短期内消除由人情和利益“互嵌”关系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难以做到的。如要减少人情关系对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的影响,首先需要转变人们已有的人治观念,逐渐转变到以法治为主的社会管理观念中来。

#### 注释:

- ① 氢氟酸是氟化氢气体(HF)的水溶液,为无色透明有刺激性气味的发烟液体,纯氟化氢有时也称作无水氢氟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能强烈地腐蚀金属、玻璃和含硅的物体。有剧毒,如吸入蒸气或接触皮肤会造成难以治愈的灼伤。
- ② 此处的毛管、明管的称谓,主要是在节能灯生产过程中予以区分的,明管即通过烤管、弯角等工序把玻璃管制作成灯管的模型,此为第一道工序;毛管则是在明管的基础上在玻璃模型管中注入荧光粉、汞,并连接导线,

形成一个发亮的灯管;整灯则是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毛管的基础上安装上灯泡的底座,经过调适就可以制作成为一个节能灯。

#### 参考文献:

- [1] 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36.
- [2] 景军.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
- [3] 礼记·礼运大同篇[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34.
- [4]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77-83.
- [5]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2.
- [6] 翟学伟.人情、面子、关系网[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173.
- [7] 费孝通.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
- [8] 朱景文.法治和关系:是对立还是包容?——从韦伯的经济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理论谈起[J].环球法律评论,2003(春季号):63.
- [9]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81-82.
-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27.
- [11] 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
- [12] 江作军,刘坤.论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J].江海学刊,2005(5):222.
- [13]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4.
- [14]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77.
- [15] 孙春晨.“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J].道德与文明,1999(1):20.
- [16] 赵海侠.浙西地区典型节能灯加工集聚区大气气态总汞污染特征研究[J].生态学报,2013(6):1020.
- [17] 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J].探索与争鸣,2006(5):26.
- [18] 史晋川.人格化交易与民间金融风险[J].浙江社会科学,2011(12):25.
- [19]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7.
- [20] 吴菲,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交换理论述评[J].理论观察,2007(1):51.
- [21] 王尚银,刘朝峰.人情关系“货币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2011(2):33.

责任编辑:陈向科